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日前,由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担任总顾问的大型历史场景课《隐秘的细节》上线播出,受到观众喜爱。该作品与以往的历史讲述具有明显区别,并未重述观众耳熟能详的王朝帝王故事,而是采用唯物史观,从大量出土文物、经典古籍中,重新梳理祖先创造文明及其演进过程,力图描绘出一幅中华文明演进史的辉煌画卷。节目播出后,不少观众称赞节目“知识量巨大”“刷新历史观”,许多历史爱好者还提供了许多史料来佐证和呼应节目观点,网友纷纷以发弹幕和二刷的方式为节目点赞,力赞这是一档“不一样的历史节目”。

观看这档知识考古节目,记者感受到了在这个节目看似平稳严谨的表面之下众多活跃跳动、有趣有料的亮点。

比如第一集,开篇讲殷商部落的都邑为什么会在一百年内七次迁徙,是因为出土的工具都是石器,使用这种工具的农业还很原始,祖先生存必须有渔猎补充。节目模拟出祖先当时简陋的居所,并动员大家带入常识,如果你手里只有石头工具,即使你运用今天的经验,也难以盖出恢弘的殿堂。

这样的发现在节目中几乎每三分钟就会贡献一个。比如讲到殷商中期,部落各个城邦之间的交流情况,节目引述史料细节,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商王大戊时代曾经有“重译而至者七十六国”。节目解释说,重译就是各方交流要通过多重翻译,互相才能听得懂对方的意思。在没有通用文字、方言阻隔严重的时代,这一文明交流的景观,被著名演员黄志忠讲得妙趣横生。正是因为这些交流,殷商部落向西戌派出了特使,学会了车辆的制造技巧,并且在五年后制造出了第一辆战车。

第二期“青铜的铲子”,节目重点梳理了祖先们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从定居时代进入城邦时代的文明发展历程,寻找青铜文物的年代顺序中隐藏着的文明交流的宏大景观。节目采取了悬疑侦探片式的结构,两次提出“殷商为什么要迁都”的问题,一步步打开上古先人们的生活图景,从筛查水文、地理等自然条件开始,推及生产和社会组织能力,指出生产能力决定着生活方式,只有青铜工具的制造和普及才能解放生产力。

而循着青铜器考古发现的草蛇灰线,人类青铜文明交流的南北两条路线一寸寸显露出来。节目持续追踪,向观众展示了中国祖先们学习车辆制造和马匹驯化技能的进程,串联起陶寺文化、二里头、三星堆这一颗颗考古明珠,最终掀开了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东亚大陆的中原文明之间交流的绚丽画卷。正是这些文明成果不断地汇聚融合、创造升级和走向成熟,才促成中原数千部落逐步进入永久定居的城邦时代。

在节目中,很多史书上原本就有清晰记载但被后世忽略的细节,被以当代视角重新发现和解读。如节目深入《史记》和《竹书纪年》,从其中记载的殷商战争发生的数量和频率分析出,是财富积累带来了战争频发。节目还通过殷商六次迁都的轨迹,推论商王朝其实是在下一盘大棋:通过不断地迁都来“跑马圈地”,完成了它对中原最肥沃土地的圈占。最终,盘庚为这个圆选择了一个最适宜统治的制高点,它就是殷,后来的殷墟,今天的安阳。最终,

通过定都殷,商朝进入城邦时代,并缔造了东亚大陆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繁荣的商业文明。

《隐秘的细节》第三集接续盘庚迁殷之后的历史,讲述城邦时代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满天星斗,讲述连接城邦的道路网的兴建,以及不断延伸的道路所带来的交易、买卖和商业的空前繁荣,讲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财富爆发和殷商所开创的若干历史第一。除了纵横千里的历史鸿篇,节目中也藏着满满精微的趣点与看点,比如,观众将看到古代情人们互赠的定情信物,了解中国的货币被统称为“钱”的起源,一探殷商王朝惊人的财富规模,还能从甲骨文的造字法中了解中国先祖们最坦诚直白的财富标准。

记者了解到,《隐秘的细节》第一季一共十集,全部聚焦于中国的殷商时期,展现了祖先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从迁徙时代进入定居时代、从城邦时代进入王朝时代的壮丽过程,其中诸多新颖的观察让人耳目一新。

这个节目从文明演进史进入,跳脱了帝王个人恩怨、道德高下的传统叙事,借鉴了当代人类史研究的方法,在努力与世界交流的同时,更多关涉了当代观众学习历史应有的意义。正如节目中所说:中国是人类社会实践最丰富的试验场。“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五千年,地域宽度从温带到热带、从沿海到高原,参与实验的人数之多、聚落数量之众,都是毋庸置疑的全球之最。这些自然形成的条件,造就了这个属于全人类的异常珍贵的经验样本,全球今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种种现象,几乎都可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找到清晰的影子,并且为解决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经验和教训参考。”

据节目总导演、总撰稿关正文介绍,在第一季中,节目着重讲述的部分有青铜文物的年代线索,最初的金属科技在中国大地的传播过程,还有甲骨文这一重要文明成果的演进过程,以及像今天石油运输线一样关键的金道锡行这一青铜资源运输线保卫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节目还讲述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次神权之战,这听起来实在太陌生了。

关正文介绍说,《隐秘的细节》从脚本撰写到制作完成超过了两年时间,邀请嘉宾除了史学大家葛剑雄之外,还有著名哲学家吴伯凡、历史地理学家李晓杰、货币历史学家王永生等。“我们做得非常认真,力求做到每个讲述点都有扎实的依据,脚本光是引文注释就有几百条。互联网也帮了很大的忙,不做这件事,你就无法想象网上有多少历史爱好者,真的是藏龙卧虎,很多新的观察和发现,都是他们提供的。”

尽管如此,在各类娱乐节目竞争激烈、受众注意力难以集中的环境中,一档讲述历史的节目想要获得传播热度,其困难程度依然是可想而知的。这个采用了大量三维制作的节目并没有广告冠名,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关正文说:“对一个以前没有先例的东西,你不能要求市场在没看到结果的时候就认同你,这是你触碰新题材时该有的心态。各个出品方主动投资制作《隐秘的细节》,首先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认识历史、认识中国这件事应该做、值得做,其次是我们对这个伟大的题材有信心,对我们自己的努力有信心。”

【人物志】

翻译家罗玉君：一直与《红与黑》做好朋友

□张洪刚

罗玉君(1907—1987),原名罗正淑,四川岳池县人。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28年赴法国留学,1933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于1935年10月至1937年7月任职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成为投身青岛早期现代教育的女性代表。在此期间翻译法国名著《红与黑》,出版后很快成为通行本,深受读者喜爱。

1933年10月,罗玉君与她的丈夫李珩一起回国,通过朋友引荐,时任国立山大文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的黄际遇聘请李珩到山大任职,罗玉君与李珩一家三口到了青岛。黄际遇、蒋丙然前去码头迎接,当晚宴请了夫妇二人。彼时罗玉君因女儿幼小没有任职,直到1935年10月任职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讲师兼女生指导,讲授哲学概论。据《国立山东大学周刊》刊载:本大学鉴女生人数,较前增加,不可无人指导,爱聘罗玉君先生为讲师兼女生指导,文理学院新设哲学概论一学程,即由罗先生担任讲授。

从1930年到1937年,国立山大中文系只有两位女讲师,第一位是方令孺,第二位就是罗玉君。当时中文系师资力量可谓强大,教授有游国恩、姜忠奎、闻宥、丁山、老舍、胡鸣盛、黄孝纾等人,讲师有罗玉君、沈从文、萧涤非、彭啸咸、台静农等人。在青岛,罗玉君夫妇与黄际遇交往甚密,黄际遇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1936年2月13日:晨起清行囊,分广州者六件,归汕者二十余件,老鼠搬疆更相关也。晤智斋,即来宏成发补日记。为纫秋书手卷,写《直归行》全首六百余言,以行草行之。心思二王(孟津、阳明)之意,欲出矣简劲清迥而未能也。智斋来共饮几爵,亦索一轴以爪印之迹。晓舫玉君夫妇来(各资饷行粮)。值得一提的是黄际遇50岁生日时,罗玉君亲自拍照,为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

在青岛,罗玉君还参加了国立山东大学的许多学术活动,包括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会。“1933年11月24日,徐光启先生三百年纪念祭下午三时在科学馆举行。主会者大学数理学会,到会者数学物理两系全体师生,到会者蒋右沧(李珩代表)、教育局王科长、赵太侔、杜毅伯、赵涤之、罗玉君。”1936年11月28日,国立山大校务会议通过设立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决议,罗玉君与校长林济青、汤腾汉、汪公旭、宋君复、张紫维、王秩疆、王文元、邓初、施畸、叶方哲组成委员会。

也是在国立山东大学期间,罗玉君坚持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杰作,对19世纪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玉君早在1932年与《红与黑》结缘。她当时在法国巴黎大学,为了文学预读心理分析学,听从乔治杜马先生的建议,买来经典作家集版《红与黑》上下册,热情地读了起来。罗玉君读了一遍后,便有意把它翻译成中文。因当时忙于写博士毕业论文,她只译了五六章,翻译工作就搁置了。

1933年罗玉君到青岛后,又着手开始翻译《红与黑》。她曾这样回忆:“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结婚,一九三三年我回国,定居在绿油油的青岛后,我又才重理就业。那时我在山东大学教课之暇,总

是临窗伏案,做这种翻译工作。不料七七事变起了,卢沟桥的炮声,不但毁灭了我们青岛理想的乐园,也打断了我的《红与黑》译本的繁华的梦幻。”

《红与黑》这部近50万字的小书晦涩难懂,涉及繁多的历史背景、宗教典故,要求译者必须翻阅大量资料以注释,可以说“工程浩繁”。“为了克服译书的困难,罗玉君参照了各种法文版本,也参考了《红与黑》的英译本。翻译实际是一种再创造,除了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外,译者本身的文学素养和写作风格也会融入译作之中。”

罗玉君译完《红与黑》已是抗战后期,烽火燃遍半个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过了黄河侵犯山东,山东大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影响。11月,教育部令山东大学南迁,代理校长林济青组织全校师生从青岛撤退。此时罗玉君夫妇离开国立山东大学,她先后任成都华西大学、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51年起,罗玉君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抗战期间,罗玉君在迁徙流离中,一直把《红与黑》的译稿带在身边,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在1947年夏天全部翻译完毕。1948年夏天,她又进行了全文的校对与部分的抄写。罗玉君曾回忆说:“今年暑假,成都多难。在米荒水灾之中,我一直与《红与黑》做着好朋友。每天写得腰酸,写得手软,写得朵朵的黑云,从我眼底飞来飞去。但是我决心要把这个难产的孩子哺育成人……我不敢说我的《红与黑》是名作名译。但是这译本的工作,经过了 my 少女时期,少妇时期,它的年龄比我的长女还大三岁。这不能不算是我的生活史上的一个纪程碑。因此我珍重这译本。”

罗玉君的《红与黑》译本,1949年由正中书局出版,至今仍不断出版,发行量多达数十万册,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她的译文不仅保留了原作人物的语言个性,而且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鲜明节奏。此书的翻译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学翻译上的地位。”赵瑞蕻评价罗玉君的译本“译笔生动流畅,在我国普及《红与黑》这本杰作方面,罗女士做出了贡献。”

罗玉君还翻译了乔治·桑《安吉堡的磨工》、雨果《海上劳工》、莫泊桑《我们的心》等作品,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很大贡献。1987年8月20日,罗玉君因脑溢血,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终年80岁。



1936年,罗玉君与3岁的女儿在青岛。

【文化观】

历史场景课,原来可以这样细节还原